



艺术家的童年

4

● 古元

● 戴爱莲

● 新凤霞

童年文库



艺术家的童年

4



新蕾出版社

《童年文库》
艺术家的童年④

*

新蕾出版社编辑、出版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5.75 插页5 字数73,000

1985年3月第1版

1985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统一书号：R10213·288

定价：0.71元

编者的话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今天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幸福地度着自己童年的小朋友，一定想知道那些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做出了贡献、增添了荣誉的叔叔、伯伯、阿姨是怎样度过他们人生的第一阶段——童年的。他们是不是也象我们一样无忧无虑地学习和游戏？为了满足小朋友们的要求，我们编辑了这套《童年文库》，目的在于用朴实的文笔、生动的形象向小朋友们介绍我国当代的作家、艺术家、科学家、体育冠军和其他著名人物童年时代的生活故事，使小朋友们从中得到教益和启迪。

《童年文库》包括《作家的童年》、《艺术家的童年》、《科学家的童年》、《冠军的童年》等丛书。《艺术家的童年》收有我国当代艺术家回忆他们童年生活的文章。这些文章，有的是艺术家本人撰写的，有的则是别人代为整理或采写的，都是真实的故事。在每篇文章前面，都附有艺术家的照片、签名、简历和主要艺术活动，使小读者们见人、见字，了解艺术家的历史和艺术活动，读起文章来更加亲切。

本丛书拟分若干集出版，每集约十万字左右。

本集收入了介绍艺术家古元、戴爱莲、新凤霞童年生活的文章。

目 录

黄土高原上兴起的艺术之星

——版画家古元的童年故事张作明(4)

诞生在大洋彼岸的舞蹈家

——舞蹈家戴爱莲的童年故事杨 涓(33)

回忆苦难的童年.....新风霞(49)

古元的简历和主要艺术活动

古元，原名古帝元。1919年8月5日诞生于广东省中山县那洲乡。1932年入广东省立第一中学。爱好美术，课余常作水彩写生。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家乡做小学教师，后参加抗战宣传队。1938年去陕北，入陕北公学分校学习。并参加课余美术小组。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春，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学习，开始进行木刻创作。1940年6月在“鲁艺”毕业后，到延安县川口区念庄乡参加农村基层工作，体验生活。翌年5月回到延安，任“鲁艺”美术工场木刻组长，兼部队艺校美术教员。因木刻创作的成就，获延安青年文艺甲等奖。1942年参加延安整风和文艺座谈会后，努力研究借鉴民族民间艺术，创造了木刻民族化的新风格。其作品在重庆举行的全国木刻展览会上展出后，徐悲鸿曾撰文倍加赞扬。1943年到三边^①一带体验生活，搜集民间剪纸。次年任“鲁艺”美术研究室研究生、创作组长。被选为文教模范，出席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并受奖。1945年任“鲁艺”美术系教员，创作组长。同年11月，随“鲁艺”师生离延安，前往东北。因途中受阻，留

^① 定边、靖边、安边。

在华北解放区，任华北大学文艺学院美术系教员，在广陵县参加土改。1947年在松江文工团做美术工作，到五常县再次参加土改。翌年调任《东北画报》美术记者。1949年作为中国代表团团员，赴捷克斯洛伐克，参加拥护世界和平大会，并访问苏联。1950年调任中央新闻摄影局美术研究室副主任。1951年获文化部颁发的新年画创作二等奖。次年，任人民美术出版社创作室主任。赴朝作战地写生。1953年开始创作水彩画。1956年访问印度。1957年回延安访问、写生。1958年后调到中央美术学院任教授、版画系教研室主任。1960年赴太湖地区写生，回京后举行水彩画展。次年访问匈牙利、保加利亚，并举行个人画展。1962年任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第一画室主任教师。1963年作为中央慰问团成员前往河北省水灾地区进行慰问。翌年访问越南。

1972年创作《回忆延安》等作品。1973年参加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访问日本。翌年再次回延安，到念庄看望乡亲。1976年以后，曾赴海南岛、井冈山、新安江、华北油田和东北、新疆等地写生，或举行画展，进行讲学。创作大量水彩画。1978年访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1980年中国美术家协会举办《古元画展》。1981年访问法国。

1979年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1983年任院长。

古元的作品，无论《减租会》、《人桥》、《刘志丹和赤卫军》，还是《运草》、《玉带桥》、《瑞雪》等，都反映了人民生活 and 积极健康的思想感情，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深受群众喜爱，并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经常在国内外展览，为许多美术馆和博物馆收藏。东北新华书店和人民美术出版社先后出版并增订再版了《古元木刻选集》。还出版有《古元水彩画

选》等。

古元曾任第一、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现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自1949年以来，他任历届全国文联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1980年起兼任中国版画家协会副主席。

黄土高原上升起的艺术之星

——版画家古元的童年故事

张作明

田园之趣——美的幼芽

没有接触古元之前，我曾以为他大概是个陕北人。因为他创作了那么多反映陕北人民生活 and 斗争的作品，其中流露出那么真挚、淳朴、深厚的感情，象是一个眷恋养育自己的故土的诗人，从内心深处流淌出来的一首首深情的诗。初次见到古元的时候，忽然又觉得他也许是个山东人。堂堂正正的“国”字形脸庞，端庄、饱满，大眉大眼，颇有点山东大汉的模样。后来才知道，他既不是陕北人，也不是山东人，而是孙中山先生的同乡——广东省中山县人。“五四”运动爆发的那一年，1919年8月5日，古元诞生在中山县那洲村一个农民家庭里。中山县濒临南海，靠近澳门和香港，这儿到国外去谋生的人很多，是个著名的侨乡。古元的父亲年轻时跟同乡们一起去南美洲的巴拿马，在一个同乡开的小店里做杂活。后来那位同乡年纪大了，要“归老”还乡，准备把小店顶给他。他就回家乡结了婚，然后带着妻子返回巴拿马，顶替那位同乡，开了夫妻店。小店经营日用杂货，主顾大多是开凿巴拿马运河的工人，其中有不

少是中国人。他夫妻俩过着节俭的生活，经营了大约十年光景，积攒下一些钱。因为思乡心切，就结束了店务，返回故乡，重建家园，又过起鸡鸣而起，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这时候，古元诞生了。

解放前，中山县的农村，取名字喜欢与文庙、关帝庙沾点边儿，用“文”、“帝”、“关”字的很多。古元原名古帝元。他有一个哥哥，三个姐姐和两个弟弟，一个妹妹。靠父母在国外多年的积蓄，家庭经济生活还比较稳定，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小康之家。

古元的童年时期是在家乡度过的。从记事的时候起就随父母学做些轻微的劳动，摘瓜摘豆，收菜、喂鸡，割稻时在场上看谷子，轰麻雀。村子周围有许多松树，他和小伙伴们一起去用耙子搂干树枝，弄回家做柴烧。他非常热爱大自然，喜欢与小伙伴们游水、抓鱼，捉螃蟹，拣田螺，他们用泥把小水沟堵起来，然后用戽斗把水淘干，就能捉到泥鳅、鲫鱼，好不快活！他尤其喜欢放风筝，风筝都是自己动手做的，做好了，就与小伙伴们到村外去放，风筝越飞越高，他们跑着叫着，那个高兴劲儿就没法说了。童年的田园生活对古元的艺术有深远的影响。

1926年古元七岁了，开始在村里上小学。每天放学回家，作完了功课，总想出去玩一玩。他的父亲是个农民，虽然也识得几个字，可是教育方法很简单，只是一个劲儿地叫他多读书多写字。虽然古元的功课已经很好了，父亲还是不许他出去玩。于是他就想办法对付父亲。他先把做好的风筝缠好线绳，从窗户里扔出去，然后自己挎上一只篮子，说是去摘豆角，出了家门，就去找小伙伴放风筝。

古元的母亲出身很苦，从很小就给有钱人家当婢女，连自己的家究竟在哪儿也不知道。因此古元生来就没有见过自己的外公外婆。卑微、孤苦的生活，使古元的母亲早熟、聪颖，能干，性情温和，同情受苦的人。她喜欢种菜种花，把家务料理得有条有理。她的气质，对古元性格的形成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1929年，古元转到省城广州去读书。1932年高小毕业以后，考入广东省立第一中学。省立一中的前身是清末洋务派张之洞办的广雅书院，是一所名牌学校。校长、主任都是政界人物。学生中上层人物的子弟不少。报考一中的学生很多，古元没有后台，凭着功课好，硬考进去。为的是这个学校教学水平比较高，并且可以住校。别的中学都要走读，而他的家不在广州。

一般小孩子都喜欢画。古元小的时候就很喜欢过年时贴的年画，和庙里墙壁上画的那些画。到了初中，图画老师教给他们写生，画些香蕉、苹果。从那时候开始，他对美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省立一中在广州市郊外，周围的自然景色很好。每天下了课，古元就和梁荫本等几个爱好美术的同学一起，提着画箱外出写生。南国湛蓝的天空，如花的云朵，绿油油的菜田，金黄的稻谷，荔荫，椰林，沟渠，农舍……大自然五光十色，变幻莫测的绚丽景色，使他陶醉，画得入了迷，常常错过了学校的开饭时间。越画兴趣越浓，后来又找到丰子恺先生等编著的《西洋名画巡礼》、《艺术趣味》、《现代画派十二讲》等美术爱好者们的热门书，古元都很爱读，大开眼界。特别是十九世纪法国现实主义巴比松画派，伟大的“农民画家”米勒（1814—1875）的作品，给他留下了非常美好、非常深刻

的印象。对他以后的创作具有启蒙作用，以至于几十年以后，1981年当他访问法国，到巴比松村参观，看到米勒等画家的原作以后，在留言簿上写下了“巴比松画派是不朽的”。后期印象派画家凡·高（1853—1890）、高更（1848—1903）为艺术献身，他们那种疯狂“燃烧的激情”和色彩，也使古元难忘。

古元当时迷恋于风景画。他觉得大自然是最美的。世上不少人整天为名利奔波，庸庸碌碌，把身边许多美的东西都忽略了，不去欣赏，岂不太愚蠢了吗！古元沉浸在大自然的美景之中，对社会，对人生，都抱着一种脱离实际的美的幻想。

然而，社会现实是谁也脱离不了的，也是毫不容情的。世界上最凶残、最丑恶的法西斯强盗，正挥舞起屠刀，大举袭来。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中国人沦为亡国奴的危险，已迫在眉睫。1935年日本侵略者指使汉奸卖国贼在冀东和察绥两省成立傀儡政权，妄图侵吞华北和平津。华北危急！平津危急！偌大的华北竟不能容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爱国青年群情激愤，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下，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遭到国民党军警的残酷镇压。广州中山大学学生为响应“一二·九”运动的号召，立即组织广州的大中学生游行示威，抗议国民党政府对爱国青年学生的迫害，要求停止内战，集中全力打倒日本侵略者。抗日救亡的呼声，使古元从美的幻想中醒悟，他参加了游行示威，他的注意力从大自然转向社会。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的隆隆炮声，促成古元思想上

发生了一次飞跃。

奔向延安

日寇的侵略魔爪伸向全中国。“四·一二”靠屠杀共产党人建立起独裁政权的蒋介石，在日寇大举进攻面前，采取了“不抵抗主义”，使大片国土沦丧。正如《义勇军进行曲》所唱的那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北平、上海相继失守。广州也遭到日军飞机狂轰滥炸。人心惶惶，社会急剧动荡。省立一中被迫迁移到农村。大自然的美丽景色被敌人的炸弹破坏了，祖国同胞正遭受战乱和杀戮，古元没有心思再沉醉于风景写生了。他没有读完高中，就回到了故乡那洲村，在乡村小学校里做代课教师。为了宣传抗日，他运用自己初步掌握的绘画技巧，创作了许多揭露日寇暴行的图画，张贴在乡村街道的墙壁上。

有一天，村里来了一支宣传队，为群众演出抗日救亡的歌曲和活报剧。村里男女老少都围拢去看。当演唱到“全民族起来抗战，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时候，宣传队员和群众同声高呼，人人眼里迸发出愤怒的火花。宣传队里有一位叫谭培鑫的青年人，看了墙上贴的古元创作的宣传画以后，找到古元，邀请他参加宣传队，担任美术宣传工作。古元当即表示同意，于是就跟上这支宣传队到邻近各村去进行抗日宣传。

以后，从广州出版的《救亡日报》和《抗大》等进步报刊上，古元读到了关于红军北上抗日，二万五千里长征，陕北抗日根据地，抗日军政大学，青年训练班，陕北公学和鲁迅艺术学院等等情况的报导，以及《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讲话》等通俗的革命理论。还买到一本鲁迅先生编的《苏联版画集》，

那里面的版画，描绘了十月革命，工人农民夺取政权和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图景。这一切，在古元年轻的心里点燃了希望之火，引起他的憧憬和向往，如果在我们中国也能象十月革命以后的苏联那样，实现工人农民当家做主的社会，该多么好哇！他看到了一条光明的前进道路，立志到陕北去，到延安去，参加抗日救国的行列！

他从《救亡日报》上知道，广州设立了八路军——当时叫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可以帮助有志去延安的青年办理手续。他就离家奔往广州。广州不时响起空袭警报，街头有涂着虎皮纹样的小炮车开过，报纸，标语，演讲会，令人感到抗战风暴的气氛。古元找到八路军办事处，提出了去延安的申请，填写了一张表格。办事处负责人审阅了他的学历证件和省立一中每年结束时发给家长的关于学生情况的报告表，很快就同意了他的申请。交给他一封介绍信，叫他带上去西安，找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联系。并且嘱咐他，一路上要小心，不要随便对别人谈论自己要去的目的地。古元拿了介绍信赶回家乡，告诉母亲他要到陕北去上学。母亲懂得孩子去上学是好事，但是，常言说儿行千里母担忧，何况，又是战乱年月，怎能放心呢？她一再叮嘱古元，两年以后可一定要回家来。

1938年9月18日——这一天他记得很清楚，正是“九一八”事变七周年那天的下午，十九岁的古元怀着抗日救国的满腔热血豪情，登上北去的火车，离开广州。离开了父母和兄弟姐妹，离开了他从小生活的故乡土地，开始了革命人生道路的长征。

第一次离家远行，奔向那带有神秘传奇色彩的地方，古元的心情激动，也难免有些不安，路上会不会遇到意外的麻烦，

很难预料。这风雷激荡的年月呀！

列车在日寇飞机的空袭下，时断时续地运行。沿途到处都有逃难的人群，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流离失所。古元在拥挤、嘈杂的车厢里，熬过了三天三夜，才到达风雨飘摇的武汉。市区不时响起空袭警报，市面上一片混乱。他在武昌下了车，从这里开始语言不通，一切都要靠笔谈了。他用纸笔问路，坐渡船过了长江，到汉口，找旅馆住了一夜，再换乘西行的火车，驶向西安。不久，就传来武汉失守的消息。而在武汉失守之前四天，他曾求学的广州就已失守了。

火车继续前行了三、四个昼夜，到达西安。古元提着行李，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走出了西安车站。他无心浏览古城风貌，急匆匆按照信封上写的地址，找到七贤庄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在那里，一位穿灰布军装的工作人员亲切接待他，看了他带的介绍信，然后安排他住在一间简朴的招待所里。他最初所接触的共产党人，就使他感到亲如家人。一路上悬着的心，踏实了。下一步又将如何呢？想着想着，几昼夜的疲劳袭来，他舒舒服服地睡着了。

次日傍晚，办事处的一位负责人召集古元和另外七、八个来自不同地方的青年人开会，通知他们到陕北公学分校去学习，明天一早就起程，要步行六、七天。办事处把他们编为一个小分队，集体行动，指定其中一位大约三十岁的湖南人为组长，大家称呼他为“刘先生”。那位负责人特别强调，路上可能遇到国民党军队阻拦，要冷静、沉着，随机应变，绕着弯子前进。

从西安到延安去，在当时，可不象现在这么容易。那是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去呀！连汽车都没有，有的倒是国民党

军队把守的关卡。只要发现你是去投奔共产党，参加革命，就会把你抓起来，投入集中营。如果你读过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写的《西行漫记》的话，就可以对那一路的艰险有所了解。

清早，西安一家骡马店的院子里，一群牲口正在吃草料，国民党士兵在整理货物。这是国民党军队的一支运输队，准备返回驻地。这时候，有八、九个青年人，带着行李走了进来，为首的“刘先生”出面，找运输队带队的头目说话。他把一叠钞票塞到那个头目手里，当兵的就把几个青年人的行李放到运输队的货物一起。牲口喂饱了，驮着货物和行李出发，人跟随后，徒步走出了古城西安，直向北去。

果然不出所料。走着走着，经过一道关卡，一个个国民党哨兵瞪着眼珠子，上上下下打量着每一个过往行人，枪口上着明晃晃的刺刀。古元他们几个人心里有些紧张，万一出点岔子，就麻烦了。可是，俗话说得好：有钱能使鬼推磨。只见运输队的那个头目，指指“刘先生”和八九个青年人，对哨兵说：“都是军人家属，去找长官的！”哨兵眨眨眼睛，不敢轻举妄动。就这样，古元他们竟顺利地通过了关卡。当天下午，他们到达三原县城，找到一家小客栈，过了一夜。

第二天，“刘先生”雇来赶脚的人，两头毛驴为他们驮着行李，小分队又继续上路了。正是九月下旬天气，已经很冷了，他们到了渭水边，见河水好象流泄的黄泥浆，岸边淤积了很厚的泥沙。船工们上身穿着棉袄，下身脱得精光，站在泥浆里用力把船推到河里，才能摆渡来往的人们过河。高原上刮着西北风，四下里黄土飞扬。人被裹在风沙里，睁不开眼，浑身上下连鼻孔里都灌满了土。对从小在南海之滨长大的古元来说，干燥、寒冷、风沙，满目荒凉的沟壑，陕西庄户人的装

束、方言，以及那小小的毛驴，他都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见识和经历。走了整整一天，傍晚到了一个小村庄，他们找到一家农民的房子住下。

第三天早起，原来雇的赶脚人和毛驴要往回返了，“刘先生”他们又雇来另一个赶脚的，继续赶路。沿途经过一些村庄，他们开始见到有手持红缨枪的农民赤卫军在放哨，墙上写着大字标语“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们知道自己已经进入红区了，每一个年轻人的心哪，都感到难以形容的兴奋和喜悦。

激动，亢奋的心情，象一股温暖的春风，把古元他们几天来在黄土高原长途跋涉的疲劳，一下子都吹走了。他们身上有劲，脚步也轻快了，又继续走了四天，在第七天的下午到达栒邑县。

一到栒邑，他们顿时感到一种朝气蓬勃的气氛。各个村子里都贴着红红绿绿的标语和墙报，除了农民之外，还看到各式各样服装打扮的男女青年，穿土布的，穿洋布的，穿短袄的，穿长袍的，戴眼镜的白面书生，黑红脸膛的工人和庄稼汉……各个脸上洋溢着振奋和自豪的神情，雄壮、健康的歌声此起彼伏。目睹这一派革命气象，古元他们都知道目的地——陕北公学分校已经到了，心情象海潮一样汹涌激荡，他们不由得欢呼雀跃起来，每个人眼里都闪动着晶莹的泪花。

找到负责人，很快办好了手续，他们就成为陕北公学的正式学员了。

陕北公学简称“陕公”，是一所短期训练革命干部的学校，有学员数千人，编成几十个大队。古元被编在第44大队。

“陕公”的教师有经验丰富的革命家和理论家以及红军干部，